中国世界遗产国际传播的转向与启示

郭哲延

自1985年中国加入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(以下简称《公约》)以来,我国世界遗产事业历经40余年的发展,对遗产价值的理解与保护理念持续深化,遗产叙事的国际传播与价值阐释能力也随之提升。2026年7月,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使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,位居世界前列。进入新时代,我国世界遗产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,其工作重心从初期追求申遗数量增长与基础性保护工作,全面转向"让文物活起来""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""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"的新目标。

长期以来,中国在世界遗产全球话语体系中多处于规则适配与被动参与的角色。近年来,依托丰富的遗产资源,扎实的考古实证成果,成熟的申遗与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的数字技术,中国世界遗产的国际传播能力实现了申遗范式、文明阐释、传播路径、遗产治理四大维度的全面提升。

申遗范式的本土化创新

中国世界遗产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,最先实践于申遗规则与价值阐释层面。我国加入《公约》初期,世界遗产工作整体处于被动适配国际体系的阶段,申遗评判标准、遗存价值阐释逻辑完全依托西方主导构建的全球遗产评价体系,而中国本土遗产理念、独特遗存价值难以得到充分挖掘与精准表达。有学者指出,这主要是由于《公约》确立的话语体系及公约实施仍无法避免西方中心主义视角。随着国内遗产保护体系日趋成熟,遗产实践经验持续积淀,逐渐形成了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普适性的申遗范式。

"文化线路"是一种较新的遗产类型与保护理念,其核心在于强调对线性遗产的整体性保护,倡导跨越地域与国家边界的协同保护理念。2014年,由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"丝绸之路:长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网"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成为大型跨国文化线路遗产的标志性项目。该项目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联合申报形式成功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丝绸之路项目,也是我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,开创了多国协同调研、联合开展价值阐释、推进跨境协同保护的一体化的跨国申遗体系。同时,联合申遗搭建起不同国家深度协作的平台,构建起多元共生、平等共建、互通互鉴的跨国协作新模式,为跨地域文化遗产的全球化保护与价值阐释提供了成熟的中国范式。

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,填补了全球瓷业主题类型的空白。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单纯的古代制瓷遗址的集合,它完整呈现出一套高度集约化的手工瓷业生产体系,其可贵之处,在于其传统制瓷技艺与文化赓续至今。当下景德镇依然活跃着非遗传承人、青年从业者及海内外陶瓷艺术家。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逐步形成全新的"活态遗产"模式,也为其他国家手工业遗产的保护与阐释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案例。

文明阐释的独特性与多元化

近年来,我国逐步摆脱西方文明阐释体系下的路径依赖,立足自身历史文脉,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,丰富了全球文明的多样性。长期以来,全球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判与文明阐释深受西方理论与认知框架影响。《公约》的核心话语以及"突出普遍价值"标准往往带有一定的西方中心倾向,良渚古城、北京中轴线、西夏陵等世界遗产往往需要经过反复阐释,才能够纳入既有的遗产评价体系之中。新时代,我们不再简单套用西方评价标准,而是深入挖掘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脉络、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,让世界遗产成为传播中国声音、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。

2019年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的良渚古城遗址,实现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传播的一次重要突破。良渚古城以"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"之名亮相世界舞台,将中华史前文明又向前推了一千年。在良渚申遗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,如何让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。长期以来,国际学界习惯于沿用脱胎于西亚、地中海历史经验的早期文明判定标准,即以城邦、文字、青铜器作为判定文明的核心标尺。而良渚只符合第一条,由此形成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原生性、连续性的认知偏差。在申遗过程中,引入"复杂社会"这一人类学分析视角,立足良渚古城完备的古城格局、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、等级分明的墓葬体系以及高度成熟的玉礼器制度为考古实证,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样本。



小雁塔



良渚古城遗址

2024年,"北京中轴线——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"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,向世界生动展现了中华都城文明"气势恢宏、大度雍容、纲维有序、礼乐交融"的独特文化气质。北京中轴线既有别于西方以景观审美、公共空间为核心的城市营建逻辑,也不同于东南亚文明服务于宗教神性的轴线范式,自都城肇建之初便统领全域空间格局,依托礼乐秩序与和合中道的本土思想体系形成完整、独立、持续演进的营城体系,向世界传递了中华营城智慧与价值理念。

传播路径的数字化与立体化

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社会参与的不断深化,国际传播在传播主体、传播方式与传播受众层面同步发生调整,整体实现由"单向官方宣传"向多方协同参与的多元大众传播的深刻转型。其传播路径并非简单的单向线性升级,而是立足于遗产自身属性、适配具体传播场景所形成的差异化发展道路,整体呈现出分层、分类、全覆盖的国际传播体系。

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典型的跨国线性文化线路遗产,依托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价值,通过开展跨区域联合文物展览、建设沿线考古遗址公园、统一跨国遗产标识体系、搭建全域数字化展示平台等方式,系统呈现丝路商贸往来、文化交融的文明内核。良渚古城遗址作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史前遗产,依托中华文明探源的独特价值,形成了学术引领、圈层深耕、价值赋能的高端对话传播特征,持续举办国际遗产论坛、开展"良渚与世界"跨国古文明对话交流。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作为全球少有的持续性活态手工业遗产,依托"千年窑火不熄""技艺活态传承"的核心价值,形成了多元主体、活态共生、双向互动的全民化传播特征,构建起全民参与、自然共生的新型传播生态。

全球遗产治理角色的转变

在申遗范式、文明阐释、传播路径完成全方位转型发展的同时,我国在全球遗产治理的角色定位也实现了历史性进阶。我国从技术帮扶、人才建设、国际治理三个维度协同发力,深度参与并赋能全球遗产治理,引领国际遗产保护合作,完成了从国际遗产保护受援方,向治理贡献方的身份转型。

在人才建设层面,我国常态化开展国际培训与能力建设,搭建全球遗产人才培育体系。在国家文物局统筹下,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机构,持续开设遗产保护、监测管理等专项国际培训班,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从业者输出遗址修复、活态管理等成熟经验与可复制保护模式,为全球遗产治理储备专业人才。在技术帮扶层面,我国积极开展跨境遗产保护援助,落地本土化保护技术与实践方案,面向"一带一路"沿线柬埔寨、乌兹别克斯坦、尼泊尔等国家,落地实施遗址修复、遗产监测、保护规划编制等援助项目,因地制宜破解当地保护难题,助力全球遗产事业均衡发展。在国际治理层面,我国主动构筑区域协作平台、提升制度性话语权,2023年牵头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并设立专项基金,不断增强区域文化遗产合作引领力,广泛支持跨国文化遗产合作。

结语

从良渚实证五千年文明、中轴线阐释中华秩序美学,到西夏陵印证多元一体格局、景德镇瓷业遗存传递开放包容的文明特质,一系列世界遗产项目层层递进、多维立体地构建起独立、完整、自主的中华文明话语体系。中国世界遗产由此实现从"被动适配国际叙事"到"讲好中国故事,传播好中国声音"的跨越。40余年来,中国世界遗产国际传播实现了多维度跨越式的转型升级。立足当下,中国世界遗产的转型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。新时代文明对外传播,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推介与成果展示,而是依托本土遗产实践,不断丰富文明对话的内涵、夯实文化自信的过程。未来,要持续总结中国遗产保护、阐释与传播的本土化经验,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中国模式,进一步丰富全球遗产治理体系,助力中华文明以更加自信、开放、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,为推动全球文明互鉴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与价值引领。

[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重大专项"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"(项目批准号:24VWB030)子课题三"文化遗产学的教学培养及评估方案"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历史学院]



景德镇御窑博物馆



故宫博物院

中国岩画研究的价值、困境与对策

杨清平

中国岩画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直观实物见证,它以图像叙事的独特形式,系统留存了远古族群生产方式、精神信仰、审美体系与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线索,兼具多重价值。历经百年学术积淀,国内岩画研究已完成基础性田野普查与资料汇编工作,但普遍面临数据体系碎片化、绝对断代技术瓶颈突出、本土化研究范式缺失、保护与研究协同机制不畅、成果转化与公共传播效能薄弱等结构性问题。如何突破这些瓶颈,是提升我国岩画研究水平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。

中国岩画研究的多元价值与时代意义

系统深耕岩画研究,对溯源中华文脉、阐释民族交融历史、丰富文化遗产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。

岩画研究有助于补全文明链条,完善中国考古阐释体系

中国岩画时间跨度极大,年代从旧石器时代延续至近现代,完整覆盖多个社会发展阶段,构建起连续完整的岩画图像史料谱系。全国几大岩画体系既保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,又存在广泛的技法借鉴、符号互通与文化交融,是阐释中华文明"多元一体、兼容并蓄、绵延不绝"格局的重要物证,能够有效填补史前考古、文明起源研究等方面史料空白,完善中国古代文明的学术阐释体系。例如,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不仅为研究战国至东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社会生活、祭祀礼仪、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提供了重要线索,而且为解析中华文明的形成演进提供了岭南视角样本。

岩画研究可以见证多民族交融,夯实共同体意识的根基

中国岩画是古羌、匈奴、鲜卑、突厥、吐蕃、百越、百濮等众多古代族群的集体文化结晶,是承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文化记忆载体。不同区域岩画的符号趋同与地域分异特征,清晰勾勒出各历史时期跨区域文化传播与族群融合的路径。譬如,左江花山岩画上的"蹲踞式"人像、环首刀、长剑、羊角钮钟、铜鼓纹样等符号,不仅承载着两千多年前岭南族群的生产生活风貌与精神信仰,也从图案形态、文化内涵等方面体现出岭南与岭北文化的深入交流。系统梳理岩画文化谱系,能够厘清各民族文化同源、文脉互通、命运与共的历史逻辑,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文化实证。



宁明花山岩画

岩画研究可以助力复原古生态变迁,支撑交叉学科研究

我国岩画留存的动植物形态、山川地貌、天象气候等图像信息,是先民基于生产生活实践形成的连续性自然观测记录,具备不可替代的古生态、古气候、古地理研究价值。依托岩画题材分期、物种识别、场景解读与年代校准,可以不同程度地复原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南北区域植被覆盖类型、野生动物群落分布、水文地貌变迁与气候冷暖波动规律,为古环境演变研究提供独立的人文观测佐证。

岩画研究有助于活化文化遗产,建构中国岩画学术话语权

岩画学术研究是岩画科学保护、永续传承、创新利用的基础与支撑,直接决定岩画遗产的保护效能与价值释放水平。从学术发展层面来看,长期以来国内岩画研究多借鉴西方图像学、符号学研究范式,缺乏适配中国多民族交融格局、多元一体文明特质的本土理论体系与阐释框架。深化岩画系统性研究,能够提炼契合中国岩画遗存特征与文明脉络的原创理论,构建自主独立的岩画学术话语体系,提升我国史前文化遗产研究的国际话语权。

(下转7版)

从崖壁到展厅

——石窟遗产的当代转译与活态传播

张旭云

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寺(图1)。石窟开凿于北魏和平初年,由高僧昙曜主持开窟造像,现存主要洞窟45个、附属洞窟209个,石雕造像59000余尊,是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。绵延一公里的崖壁造像群,承载着北魏王朝的政治思想、文化内涵、艺术审美、科技水平与工匠智慧,其所开创的"云冈模式",深刻影响了后世石窟造像的营建范式。它既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珍贵实物载体,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。

云冈石窟雕刻在侏罗纪砂岩上,岩石的主要成分是石英、长石,胶结物是硅质和钙质。千余年来,在风霜雨雪、昼夜温差、冻融循环等自然环境变化的长期作用下,石窟中的雕像持续受到粉化、剥落、裂隙等病害侵蚀,再加上工业污染、游客数量的剧增等,使文物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。露天崖壁洞窟原生空间条件有限,难以兼顾文物本体安全与公众参观日益增长的时代需求。为平衡保护与开放需求,云冈研究院实行日常养护与应急修缮相结合的保护机制,通过阶段性洞窟封闭,开展病害调查、养护修缮、数字化采集、考古调查等保护与研究工作,以获取更为详细的洞窟调查资料,为石窟的保养修缮做好前期调研工作,当好"文物医生",使石窟尽量"带病延年";但长期封闭会阻隔大众接触遗产的渠道,削弱文化传播价值;而粗放式无管控开放,会改变洞窟微环境,加剧脆弱岩体风化病害,形成"保护受限、传播不足"的行业发展困境。在此背景下,云冈石窟博物馆立足遗产保护根本,秉持"保护为基、阐释为核、活化为魂"的发展理念,搭建崖壁本体与公众认知的沟通桥梁,探索出集科学保护、学术研究、创新展示、活态传播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,让千年崖壁瑰宝在当代焕发新活力。

空间重构:打造保护与利用共生的展陈新格局

云冈石窟博物馆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兴建,为半地下式专题展馆(图2),拱形钢梁屋顶融合地域风貌与现代美学,总建筑面积6640平方米。博物馆立足石窟文物保护核心需求,通过科学的空间重构,整合不可移动的崖壁造像图片、可移动出土文物与数字化成果,精准破解大型石窟遗产"保护难阐释、开放难保全"的行业痛点。

多年来,云冈石窟窟前、窟顶及周边区域开展了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,出土了大量的造像残件、建筑构件、生活遗物、题记碑刻等,它们见证了云冈石窟开凿、变迁的历史过程。其成果先后获评"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",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多部考古专著,提升了云冈石窟在考古研究、宣传展示及文物保护方面的科研能力与社会影响力。

博物馆将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标本,经研究整理后系统化地陈列展示,依托展厅恒温恒湿、防光防尘、防霉的标准化保存环境,为残损文物提供稳定安全的保存环境,有效规避因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使文物产生"二次破坏",让碎片化的历史遗存得到科学保护、有序传承与合理利用。

在展陈叙事构建上,博物馆坚守遗产原生语境,创新打造"崖壁本体+展厅阐释"的互补模式。洞窟壁面与顶部的造像高低错落、凹凸不平,受光线、距离、空间、参观时长等客观条件限制,游客实地游览过程中难以细致清晰地观赏到造像的细节,更别说在短时间内了解其雕刻造像所反映的文化内涵。博物馆通过文物实物陈列、洞窟场景复原、艺术细节放大、历史文脉补全等多元展陈方式,把崖壁无法直观呈现的工艺细节、历史脉络、文化内涵完整落地。引导观众放慢观览节奏,沉浸式品读文物细节、感知北魏工艺精髓,构建系统、完整、立体的云冈石窟文化知识体系。

如今,露天石窟保留原生空间格局与历史氛围,承担遗产本体展示功能;博物馆则承担出土文物收藏、科研保护、宣传教育、文化阐释的核心职能。二者相辅相成、互补共生,构建起完整的云冈遗产保护、展示、传播体系,实现了大型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与高效利用的双向共赢。

叙事革新:实现从瞻仰观览到文化解读的视角转型

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家营建的大型人文空间,崖壁造像承载着北魏王朝的精神寄托与审美追求,折射出那个时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。规模巨制的洞窟空间、庄严法相的造像配置,高大的佛像与游客观看的角度,构成了仰视观览的传统模式,营造出肃穆厚重又极具特点的体验氛围,让游客直观感受千年文明的震撼力量。

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核心阵地,云冈石窟博物馆以普及文化知识、阐释历史价值、传播文明内涵为核心使命,推动文化遗产从古代精神载体转变为大众公共文化资源,完成了从"瞻仰观览"到"平等对话、深度解读"的叙事转变。

展馆以出土残件为微观切入点,系统梳理云冈造像的风格迭代脉络,厘清跨地域文明互鉴的历史渊源。馆藏飞天残像虽形体残缺(图3),但线条灵动、气韵生动,完美延续了犍陀罗艺术空灵曼妙的美学特征,同时融入北魏本土雕刻技法,直观见证了外来艺术本土化的演变历程。馆藏"妙兴西北方主"带盖莲花纹石钵,通体浮雕规整莲花纹样,造型敦实厚重,钵底留存专属阴刻铭文,是云冈石窟唯一独立于造像题记之外的器物铭刻,史料价值极为珍贵,真实还原了北魏信众的信仰风貌与僧团的生活细节。窟前遗址出土的千佛残件,是云冈石窟具有代表性的造像题材之一。千佛造像遍布石窟各处,衍生出千佛壁、千佛洞、千佛列柱等多元形制,见证了北魏时代文化的兴盛发展,也为研究石窟造像体系演变提供了丰富实物支撑。

博物馆馆藏出土文物均脱离原生崖壁环境,可近距离、多角度、长时间观赏,彻底弥补了实地观览的视觉局限。展馆通过优化展陈布局、精准调控灯光光影、搭配学术图解说明,打破传统瞻仰式观展模式,将残缺遗存转化为可品鉴、可解读、可研究的独立艺术作品。以通俗化、现代化的叙事语言解码北魏艺术内涵,让观众跨越千年时空,与石窟崖壁文明隔空对话,深度读懂云冈石窟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底蕴。

科技赋能:搭建跨越千年的古今文化对话桥梁

云冈石窟崖壁造像体量宏大、不可移动,受文物保护规范与物理空间限制,传统游览模式难以让公众全方位、深层次感知石窟艺术的精髓,形成文化传播的时空壁垒。云冈石窟博物馆依托现代数字技术,打破空间与场景局限,为千年石窟搭建起古今对话的全新传播载体。

展馆打破传统文物碎片化陈列模式,以北魏历史发展脉络为核心主线,结合场景复原、造像等比例复刻、光影模拟等现代数字技术手段,高度还原石窟开凿的时代背景、空间秩序、开窟工序与艺术氛围,打造沉浸式体验的艺术空间,让千年历史场景直观重现。

展馆中央大厅陈列的第20窟主佛头像复制品,采用高精度三维数据采集、3D打印技术制作,由82块模块拼接而成,经精细打磨、仿真上色等多道工艺,1:1高保真地还原了"露天大佛"的雄浑风貌,佛像肉髻高耸、面相方圆、丰颐垂耳的经典风貌。造像融合犍陀罗外来艺术与中原本土审美,直观诠释了北魏时期民族融合、文明互鉴的历史内涵,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云冈石窟"外交大臣"的风采。

(下转6版)



图1 云冈石窟全景



图2 云冈石窟博物馆外景



图3 北魏石雕飞天像(残)